

故宫博物院藏金质盖座嘎巴拉碗

林 欢

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乾隆朝造办处档案，对嘎巴拉碗的来源、改制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嘎巴拉碗的供奉属于舍利崇拜的一种。乾隆皇帝对这些金质盖座嘎巴拉碗的供奉，不仅反映了他在佛学理论方面接受了“性空”学说，而且也反映出他借助宗教思想积极推进“因俗而治”、“恩威并施”的政策。

关键词 嘎巴拉碗 乾隆皇帝 法器 藏传佛教

嘎巴拉碗是藏传佛教中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供养类法器。“嘎巴拉”(ka pa la)为梵文音译，即藏文的“托巴”(thod pa)，本意为头盖骨。学术界早已对其使用习俗、符号意义、现实功用及艺术历史价值进行过充分的探讨。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清宫旧藏金质盖座嘎巴拉碗的特征、加工等情况作一番粗浅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乾隆皇帝对嘎巴拉碗的理解。

一 故宫博物院所藏金质盖座嘎巴拉碗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金质盖座嘎巴拉碗七件。由于其审美和历史文化价值已经远远超越原物主所赋予的宗教意义，有关部门早在几十年前便将其从宗教法器类文物中分离，作为清宫金银工艺品进行保存。以下就文物状况分别进行梳理。

1. 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379，参考号：吕一〇七九，以下称为碗一^{〔1〕})

旧藏养心殿。通高27厘米，碗长20厘米，宽12.6厘米[图一]。碗体细润，附碗盖及托座。托座底刻藏、满、蒙、汉四体“大清乾隆敬制”铭文。底板亦鑿四体铭文：“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班禅额尔德尼恭进大利益随金盖座嘎布拉碗一件。”此碗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修改完成^{〔2〕}，铭文中“班禅”为六世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dpal ldan ye shes, 1738—1780)。

2. 金盖托座镶银里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380，参考号：吕一〇七九)

旧藏养心殿。通高16.5厘米，碗长18.2厘米，宽13.4厘米[图二]。骨质黄中泛红。碗沿处有莲花纹。百会穴处有孔二。碗里镶银质内衬。其上环鑿咒语三周，另“hūm”、“bām”二字。底板鑿四体“说

〔1〕 本文提及的七件故宫博物院藏嘎巴拉碗之编号以此类推。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49册，页481，人民出版社，2005年。

〔图一〕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一）



〔图二〕金盖托座镶银里嘎巴拉碗（碗二）



〔图三〕嵌宝石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三）



〔图四〕嵌松石金盖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四）



语：“看得由内交出噶布拉一件，具‘根本经’内说：‘若其噶布拉无缝整严，色黄，形似莲花，上有莲花纹。若此等噶布拉乃修成梵行道者。或作增盛法事为最贵者。’此噶布拉亦严整，无缝，黄色，形似莲花，亦有莲花纹。职有二孔，成道岳机尼之大利益噶布拉是实。为此谨奏。”因其与碗一同处供奉，被记为“人脑骨盒一对”^{〔1〕}。

3. 嵌宝石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381，留平号：56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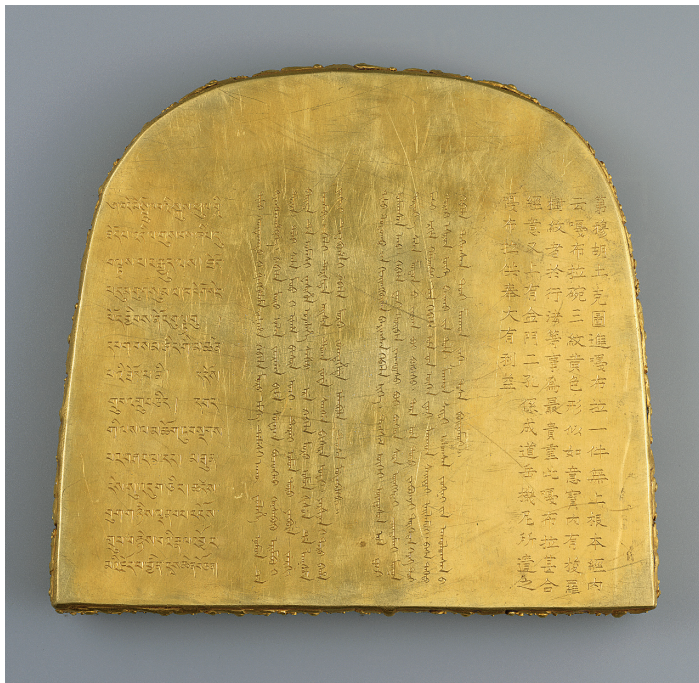
通高28厘米，碗长19厘米，宽15厘米〔图三〕。碗体灰黄，碗沿及碗里镶金质内衬，因年久失修，内衬与碗体分离。碗体内壁贴有一张黄色纸条，上有“头等阿木鲁绰沃斯甲”九字。底板錾四体《古噶巴喇供碗赞》。

4. 嵌松石金盖座镶金里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383，留平号：87573)

通高26.5厘米，碗长18厘米，宽13.7厘米，底板长20厘米，宽17.5厘米〔图四〕。碗体黄色，百会穴处有孔二。金质内衬上环錾咒语，与碗二同。底板錾四体“说语”：“第穆胡土克图进噶布拉一件，‘无上

〔1〕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养心殿》第6辑，页291，线装书局，2004年。

〔图五〕嵌松石金盖座嘎巴拉碗（碗四）底座铭文



〔图六〕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碗五）



根本经'内云：'噶布拉碗三纹，黄色，形似如意宝。内有梭罗树纹者于行法等事最为贵重。'此噶布拉甚合经意，又上有金门二孔，系成道岳机尼所遗之噶布拉，供奉大有利益。”此器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修改完成，后交热河庙堂供奉^{〔1〕}。文中“第穆胡土克图”为六世第穆胡图克图绛白德勒嘉措(vjam dpal bde legs rgya mtsho, 1723—1777)。乾隆三十六年(1771)为已归附清朝的蒙古信众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竣工，适逢土尔扈特部东归和皇太后的寿辰，六世第穆进献此碗颇有纪念意义〔图五〕。

5. 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698，参考号：吕一一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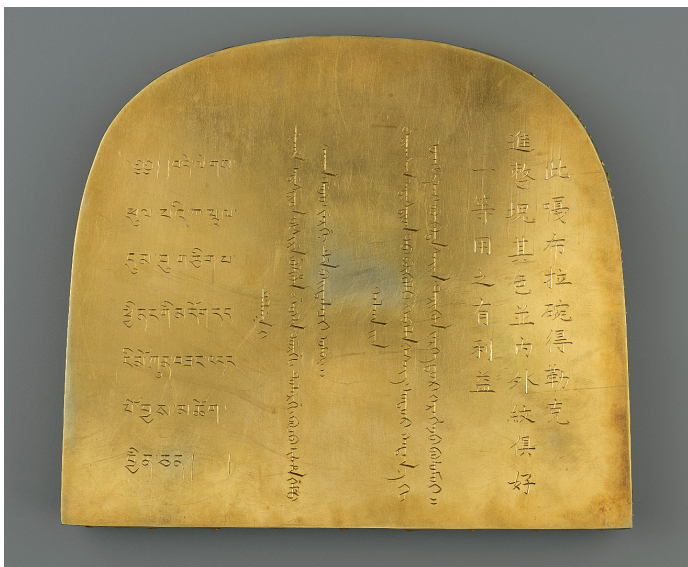
旧藏养心殿。通高27.8厘米，碗长17.7厘米，宽16厘米〔图六〕。碗体色黄。金质内衬上环镌咒语一周，与碗二同。底板镌四体“说语”：“此噶布拉碗得勒克进。整块。其并内外纹俱好，一等用之有利益。”〔图七〕此碗完工于乾隆四十年(1775)^{〔2〕}。文中“得勒克”即郡王车凌德勒克：“乾隆三十九年袭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四十年入觐……命乾清门行走，赏三眼孔雀翎，余悉如赐其父巴木巴尔物。四十年……以车凌德勒克辖右翼旗务，诏授盟长，赐扎萨克及盟长印。”^{〔3〕}乾隆四十年，清政府开始在土尔扈特内部推行盟旗制，此碗有可能是车凌德勒克被任命为盟长时所进贡物。

〔1〕 《皮裁作》，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初七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4册，页589—590。

〔2〕 《金玉作》，乾隆四十年(1775)二月初七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8册，页293。

〔3〕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一〇三《扎萨克多罗毕锡呼勒图郡王巴木巴尔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4册，页869，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

〔图七〕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碗五）底座铭文



〔图八〕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碗六）



〔图九〕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碗七）



6. 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1699，参考号：吕三六八一12)

旧藏养心殿。残通高17.3厘米，碗长15.5厘米，宽12.8厘米〔图八〕。此碗样式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一碗完全相同^{〔1〕}，唯盖钮缺失。托座底有四体“大清乾隆敬制”铭文，底板则为《呢(尼)玛宁波噶布拉赞》。据造办处统计，其改制颇费心思且材料昂贵，仅珍珠一项便“共用正珠四百三十二颗”^{〔2〕}。档案记载同式碗共三只，其中两件饰有画像者，后移至养心殿供奉，现分存于海峡两岸。

7. 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文物号：故141356)

通高24.2厘米，座长19.6厘米，宽19.6厘米〔图九〕。骨色泛白，盖钮及嵌件有脱缺。其形制同碗三。

据记载，内廷在乾隆年间改制了上百件嘎巴拉碗，但金质盖座嘎巴拉碗所占比重极少。这些碗具的样式与藏地传统相近，但表现出了更多的清宫特色。可惜的是，经过二百多年的劫难，这些碗至今多离散不存。

二 清宫嘎巴拉碗的制作过程

清宫制作“嘎巴拉”法器的具体过程，在造办处档案中有着较为详尽的记载^{〔3〕}。此段文字记录了从

〔1〕 蔡玫芬：《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页194—195，台北故宫博物院，1999年。

〔2〕 《金玉作》，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二十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53册，页103—105。

〔3〕 《记事录》，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十七日，《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39册，页410—420。又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辑：《乾隆四十一年制作“嘎巴拉”记事录》，《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图十〕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底座铭文(碗二)



〔图十一〕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具有特异形状的嘎巴拉碗
图版采自蔡玫芬:《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页191。



〔图十二〕嵌宝石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三)颅内黄签



选料、制作到陈列于重要佛堂的全过程。是今人了解清宫嘎巴拉器物制作过程的重要资料。

（一）颅骨来源

1. 藏地原造之器的来源

嘎巴拉碗乃佛门圣物，只有那些生前深刻领悟过佛门妙法真谛的高僧大德在圆寂之前发愿施舍的遗骨才可制成嘎巴拉碗^{〔1〕}。碗二、碗四即“成道岳机尼”所遗〔图十〕。“岳机尼(yogini)”指在密法修炼境界佛学功底深厚，道行高深，且具有较高成就的修行尼僧。

某些高僧颅骨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异形式，颇具佛教圣物含义。我们从碗二、碗四的“说语”中所提到的形状、颜色、瓣数、花纹图案以及其他祥瑞之兆，即可体会其要略。例如人们以碗上“无缝整严”者为佳。而一些有关骨骼生长与血脉走向的痕迹，也被佛教徒视为大成就、大吉祥之象征。如碗四有“梭罗树”纹，“梭罗树”即娑罗树，据说释迦牟尼便圆寂于此树下，台北故宫博物院亦藏同类碗^{〔2〕}，令人惊奇〔图十一〕。

2. 造办处仿制器之来源

碗三为大金川首领“阿木鲁绰沃斯甲”之颅所制〔图十二〕。阿木鲁(1734—1776)本为金川大土司之一，“绰(沃)斯甲”则为部落始祖名、部落名和地域名^{〔3〕}。第二次金川战争(1771—1776)中，阿木鲁奉索诺木兄弟之命抵抗清军^{〔4〕}。战后包括其在内的十二人被凌迟处死，众人骨骼经挑选后被制成嘎巴拉法

〔1〕 罗文华：《藏传佛教祭法器——嘎巴拉碗》，《紫禁城》1996年第2期。

〔2〕 蔡玫芬：《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页190—191。

〔3〕 晏春元：《绰斯甲土司制度概述》，《西藏研究》1989年S1期。

〔4〕 冯明珠主编：《金川档》，《“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专案档暨方略丛编》第六册，页4437，台北故宫博物院，2007年。

〔图十三〕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碗六）的碗盖



〔图十四〕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二）的碗盖



器^①。此碗的存在为以战俘头骨制作嘎巴拉碗的传说提供了有力证据。碗七与碗三形制相同，其颅骨应来源于与阿木鲁命运同等悲惨者。

（二）造办处的改制

故宫博物院现藏嘎巴拉碗绝大部分口沿断面清晰自然，应当是经过了精细计算和打磨。

乾隆时期一件配饰完整的清宫嘎巴拉碗须由盖、碗、里、座托（支架）与底板四部分组成。弘历曾将碗分为三个等级：“头等”碗两种，第一种需配金镶松石盖座，第二种则配金里、金盖座；“二等”碗配银里、银盖座。金盖通体凸镌花卉、吉祥八宝纹或六字真言，某些“头等”碗盖的腰部或口沿部分还会额外环嵌珠宝〔图十三〕。盖钮则有火焰式或金刚杵式，其上亦嵌各色宝石〔图十四〕。就某些低等级的供碗而言，其装饰较奢华〔图十五〕。

底座分为座托和底板两部分，外壁均饰有火云及海水江崖纹，束腰上饰有骷髅或人头。相对而言，那些嵌有松石、具有各形碗托且碗托加衬垫、支架底部封闭的供碗等级较高。座托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有碗托的座托支架〔图十六〕，支架为三角形或椭圆形伏状坛城式，有敞开或闭合两种〔图十七〕。第二种，只有三角形支架而无碗托，仅凭骷髅（人）头装饰与山形火焰纹作为支撑〔图十八〕。部分高级供碗的座托支架之下还有一个中空的底板，托面中间留有一外圆内方之孔，周围留有容纳三角形支架的凹槽〔图十九〕。底座之下所镌文字不仅记载了骨料甄选标准及其来源，也反映了时人对于佛理的认识。

① 故宫博物院中正殿区梵宗楼原状佛堂尚藏有索诺木腿骨号，台北故宫博物院则藏有莎罗奔颅碗。

〔图十五〕铜质盖座嘎巴拉碗



〔图十六〕金盖托座镶银里嘎巴拉碗（碗二）的碗托支架



〔图十七〕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一）的封闭式支架



〔图十八〕嵌宝石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三）的支架



〔图十九〕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碗五）的底座



〔图二十〕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碗六）



〔图二十一〕金盖托座镶银里嘎巴拉碗（碗二）



〔图二十二〕金盖银镀金托座嘎巴拉碗（碗五）的碗内咒语



碗内加工的目的是遮掩血脉痕迹，方法有二：一是进行碗内绘画，如碗六〔图二十〕。二是“配碗里”，即在碗内按等级镶嵌金属内衬〔图二十一〕。碗一、四、五、六之内有用阿礼嘎礼（alikali）字母篆刻的以念珠项链的形式排列的咒语一或三周〔图二十二〕。此咒由梵文的十六个元音和三十四个辅音

构成，具体内容为：a ā | i ī | u ū | r̥ r̥ | l̥ l̥ | e ai | o au | aṃ aḥ | ka kha ga gha ṇa | ca cha ja jha ṇa | ta tha da dha ṇa | ta tha da dha na | pa pha ba bha ma | ya ra la va | śa śa sa ha kṣa^{〔1〕}。另外还有 taṃ, khaṃ, paṃ, aṃ, maṃ, draṃ, huṃ, hūṃ, om 等种子字分布其间。佛教密宗称“咒”为“真言”，将其看作是佛、菩萨、诸天的密语。禅修者都相信的口诵真言并观想悉昙诸字时，能与神沟通并取悦于神^{〔2〕}。

以上诸碗的底座中间部分皆有凸起，云尾呈螺旋式散开状的“火花云纹”〔图二十三〕。此类纹样大小一致，当为事先制有某种戳印，利用金属的延展性在表面直接捶打并一次成型的技术。镀金工序则使金色与银色搭配恰到好处。如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所藏一碗^{〔3〕}的碗托与底板表面饰有银色缠枝莲纹，其中莲花鍍金，有一种特殊的视觉形象，加之图案线条端庄流畅，在整体上提升了法器的艺术魅力。

嘎巴拉碗的制作是清宫造办处各部门通力合作的结果。除了盖、里、座的施工由金玉作的工匠们直接承担外，碗与碗托之间配毡垫锁边以及制作“鞞皮画金匣”等任务由匣裱作完成；碗内绘画交中正殿完

〔1〕 萨尔吉先生认为咒语内容出自《金刚心庄严怛特罗》（*Dpal rdo rje snying po rgyan gyi rgyud*）“真言品”。藏译文本见德格版大藏经之《甘珠尔》，十万续部（*rgyud 'bum*），*cha*函，经号：451，第38叶正面第6行至背面第3行。其中“a ā | i ī | u ū | e ai | o au | aṃ aḥ |”等元音（符号）被标记为阴性，“r̥ r̥ | l̥ l̥”为中性；“ka kha ga gha ṇa | ca cha ja jha ṇa | ta tha da dha ṇa | ta tha da dha na | pa pha ba bha ma |”五组辅音被标记为阳性；“ya ra la va”一组辅音被标记为“生”（*byung ba'i'o*）；“śa śa sa ha”一组辅音被标记为“灭”（*jigs pa la sogs pa'o*）；“kṣa”则被标记为“法界种子”（*chos kyi dbyings kyi sa bon no*）。另外在《金刚心庄严怛特罗》中：“vajradhr̥k hūṃ | jinajik bhr̥m | ratnadhr̥kām | ārolik jrem | prajñādh̥rk kham |”这些是五空行真言（*mkha' 'gro chen po lnga'i'o*）；“dveṣarati mām | moharati lām | rāgarati pām | vajrarati tām |”这些是坚固金刚空行等的真言（*rdo rje mkha' 'gro rten par byed pa la sogs pa'i'o*）；“kṣitigarbha kṣi | vajrapāṇi jri | gaganagarbha kham | lokeśvara gam | nivarāṇaviskambini kam | samantabhadra sam |”这些是行三昧耶金刚空行等的真言（*rdo rje mkha' 'gro dam tshig spyod pa la sogs pa'i'o*）和妙丽金刚空行等的真言（*rdo rje mkha' 'gro mdzes par byed pa la sogs pa'i'o*）；“rūpavajra jah | śaptavajra hūṃ | gandhavajra bam | rasavajra hom | sparśavajra kham | dharmadhātuvajra ram |”这些是妙丽金刚空行等的真言（*rdo rje mkha' 'gro mdzes par byed pa la sogs pa'i'o*）；“yamāntakṛt | prajñāntakṛt | padmāntakṛt | vighnāntakṛt | akkirāja | niladaṇḍa | mahābala | acalekaṇa hūṃ | sumbhani hūṃ | cakravṛtini hūṃ bhūṃ |”这些代表了阎摩金刚空行等的真言（*rdo rje mkha' 'gro gshin rje'i gshed la sogs pa'i'o*）。

〔2〕 王邦维：《高罗佩与“悉昙”》，《读书》2011年第1期。

〔3〕 孙福何：《藏传佛教法器——嘎巴拉碗》，《中国文物报》2012年10月10日第8版。

〔图二十三〕嘎巴拉碗（碗七）座托上的火花云纹



〔图二十四〕嘎巴拉碗（碗五）的包装匣



成；至于“刻四样字”的任务则由大喇嘛、军机处或中正殿完成。最后，造办处的负责人会进行查验，并将改做完成的碗及原例一并呈览，核准之后或安放于养心殿、中正殿及热河等处相应佛堂以备替换，或予以包装，盛于方形鞞皮匣中收贮备用〔图二十四〕。

三 乾隆皇帝与嘎巴拉碗

（一）作为密宗法器使用的嘎巴拉碗

嘎巴拉碗是修“无上瑜伽”部时用于灌顶仪式的法器。一名密宗修持者在密法修行过程中需要接受多次不同的灌顶，乾隆皇帝也不例外，仪式中所用的器具也由他自己准备齐全^{〔1〕}。六世班禅于“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当天，在宁寿宫向弘历传授密法^{〔2〕}，恰与碗一铭文所示时间相合，碗一应是当天活动的物证〔图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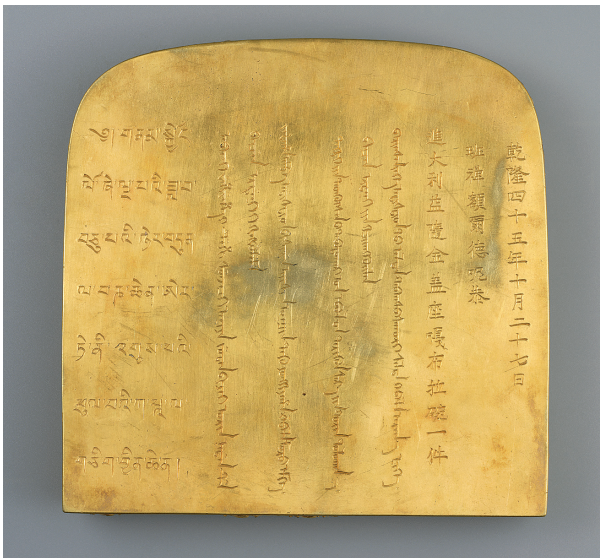
（二）作为舍利进行供奉的嘎巴拉碗

按照佛家的理论方法，“空性”和“大悲”是实现延寿，进而修法成佛的关键。“嘎巴拉”从更深层次上来看代表智慧与方法，恰恰具有“空性”和“大悲”的象征意义。

〔1〕 （清）土观·洛桑却吉尼玛（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页182—183，民族出版社，1988年。

〔2〕 王晓晶：《六世班禅面圣授法史实考》，《中国藏学》2013年第2期。

〔图二十五〕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一）的底座铭文



〔图二十六〕嵌宝石金盖托座镶金里嘎巴拉碗（碗三）底座上的铭文《古噶布拉供碗赞》



1. 弘历的嘎巴拉赞文

弘历的三篇嘎巴拉赞文均为修行的个人心得。《古噶布拉供碗赞》：“我闻在昔，佛月光明。以头施檀，普渡众生。左旃檀涂，右利刀割。于此二人，不分别拨。五印三藏，古德多有。用是义例，自施其首。十方十色，一以化之。同凡悲仰，共圣慈悲。是真供养，无供养者。作赞饶舌，波罗般若。”〔图二十六〕《呢玛宁波噶布拉赞》：“呢玛宁波噶布拉，舍身为清静供养。博密山洞忽出现，二千余岁传至今。五德七宝重庄严，供养不作供养观。色见声求一切非，是谓如来之本智。”〔图二十七〕《西番古德噶布拉赞》：“西番古德，阅百余世。凡身既弃，圣迹仍示。曰‘阿’曰‘吽’，隐现二字。‘阿’寂静源，‘吽’安乐义。有为无为，色空非二。作是供养，允第一谛。”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刻有此赞的供碗上，铭文排列以满文为尊，非同藏文先于满文的惯例〔图二十八〕，当是弘历供奉嘎巴拉的最终总结。

2. 舍利供奉的现实作用

弘历将碗一、二、四、五当作“成道者”的舍利加以供奉。舍利，本意指释迦牟尼的骨灰结晶体，是其真身遗物，最具象征意义。随着佛教的传播，后人亦将历代高僧圆寂后的遗体和骨灰也称为舍利。乾隆帝对舍利的供奉有一定的现实作用。

（1）祈福

佛教认为“众生皆苦”，故而在人生解脱之方法上允许借助他力，而舍利“甚难可得，最上福田”^{〔1〕}。供养舍利代价虽小，但能获得“大利益”之功德福报，可使信仰者迅速觉悟并得以解脱。

〔1〕（北凉）昙无讖译：《金光明经》卷四，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页354，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

〔图二十七〕嵌珍珠金盖银镀金托座内画嘎巴拉碗（碗六）底座上的铭文《呢玛宁波噶布拉赞》



〔图二十八〕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古德嘎巴拉碗的铭文拓片《西番古德噶布拉赞》图版采自蔡玫芬：《皇权与佛法——藏传佛教法器特展图录》页191。



（2）传法

佛教徒们的“根器”不尽相同，如要解脱，仍需具备“大根器”者发菩提心，让众生与佛法结上善缘，使之获得正法的利益。在《古噶布拉供碗赞》语境中，月光佛悲悯众生，甚至施舍了自己的头颅。于是，“五印三藏”的诸多“古德”都效仿此例。弘历认为此举是因为他们不再“我执”。在其看来，“我”的安立之所依是“五蕴”。“五蕴”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指色、受、想、行、识。因缘而生，恰是“五蕴皆空”。另外“色空非二”、“色见声求一切非”等，同样强调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既然万物皆空，那么“凡身既弃”自是当然。

舍利信仰的价值取向在于引导众生具有“般若智慧”，破除和摆脱“我”和外在之物的执着，“令未受化者回心受化，已受化者速得解脱，得解脱者圆证寂灭究竟彼岸”^{〔1〕}。在此价值观的感召下，信众会“同凡悲仰”，并以般若智慧，即运用“根本智”的力量，认知万物本源，实现空性与慈悲的真正统一，终获涅槃。

（3）团结蒙藏上层社会

乾隆帝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当时蒙藏民族的共同宗教情感十分契合，故能赢得蒙、藏等民族上层精英阶层的倾心与拥戴。以此而言，碗五的进献，体现了东归土尔扈特人的热切期望。而碗一、四的进献，同样表达了蒙、藏各界人士对于热河、北京等地作为帝国新的宗教文化中心的认同。

（三）作为战功显示的嘎巴拉碗

佛教认为，要达到使众生解脱，需通过“俗谛”对众生加以引导。为此，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吉

〔1〕（宋）法贤译：《佛说月光菩萨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页408。

(rol pavi rdo rje, 1717—1786)宣扬乾隆皇帝是世间能够转大力法轮的君王，他不仅具有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慧，而且还具有怖畏金刚的威慑力量。他可以用智慧力量摧破烦恼业障，以威猛降伏恶魔。据说婆罗门的颅骨与被谋杀(或被处决)之人的颅骨最具法力，是修怒相神时不可多得的中介物^①。因此，磔杀那些屡教不改、顽固不化、悖逆妄为的恶人，并以其骨骼制成法器并供奉于大威德像前，可以“惩凶顽而告成功”^②。此举不仅能够求神祈福，还可以宣国威而励军心。因此碗三出现于内廷便自然而然了。另据造办处档案记载：除了阿木鲁颅碗外，内廷还供奉着其他“凶顽”头颅制作的嘎巴拉碗，如小金川首领僧格桑、“大小和卓”首领霍集占、阿睦尔撒纳之党羽巴雅尔等。

四 结论

故宫博物院所藏金质盖座嘎巴拉碗，在藏传佛教法器中属上乘之作，这些内廷制作的法器皆以藏区进献的法器为范本，不仅保持了法器的藏地特色，还透露出中原内地的风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审美意趣。同时，这些佛教法器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方面，嘎巴拉碗是密修者成就之象征和瑜伽修行思想的具体体现。作为佛教徒，乾隆帝通过有关嘎巴拉碗的三篇赞文，阐发了其对佛教义理的把握和理解，并通过国家意志将其完全体现。

另一方面，嘎巴拉碗的进献与清代逐步统一蒙藏地区有着必然的联系。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如何在西部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组织形式便成为最高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问题。乾隆皇帝在佛学思想指导下，借助封建帝王与文殊菩萨的双重身份，以蒙藏地区的普遍信仰为后盾，积极推进和维系各民族“因俗而治”、“恩威并施”的政策。他通过将宗教界高僧和世俗界王公贵族的地位提升至与清帝国高级官员相类似的方式，牢牢地掌控了蒙藏地区的政治走向，进而培养了各民族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此时，嘎巴拉碗的进献既是怀柔政策的见证，也是显示战功的窗口。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故宫博物院罗文华、春花、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扎布、北京大学萨尔吉等先生的悉心指点，审稿专家也提出了相当宝贵的意见。另外，故宫博物院张林杰、杨立为、李中路、马晟楠以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子凌等先生亦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故在此一并感谢！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

(责任编辑：盛 洁)

① [英] 罗伯特·比尔(向红笕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与器物图解》页118，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年。

② [韩] 金景善：《燕轶直指·雍和宫记》，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三辑，第9册，页16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